

第一章 增长与变革

发展研究虽然是从本世纪 50 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但发展思想的源头可以上溯到 18 世纪。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也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和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等写出了《乌托邦》和《太阳城》等书,描写了幻想中的理想社会,提出了建立公有制的主张,但当时的资本主义刚处于原始积累时期,它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因此这些理想社会只能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岛上,同当时的社会实践是脱节的。严肃的发展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形成而产生的。18 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认为,人口增长是生产进步的动力,人口增长使社会从狩猎发展到畜牧和农业,并导致手工工场和城市的出现。法国重农学派的杜尔阁认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德国的费希特和海尔德认为,人类的进步是教育的结果,促进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教育。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杰罗姆·边沁则认为,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是促进社会发展和繁荣的动力。他们的思想分别启迪了 19 世纪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看成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标志,而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特别是 19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并把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强调经济增长还是强调社会变革,是古典经济学家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在发展问题上的主要分歧,这两种发展观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工业革命打破了社会的停滞状态，造成了持续的动荡和变革。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处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各个不同的阶级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观和发展观。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强烈要求改变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他们把社会变革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看到了生产的进步和财富的涌现，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意味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把经济增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两种对立的发展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都把经济增长看作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他们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了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认为劳动分工对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他们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国民财富增长的两种主要方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主要靠加强分工来实现；二是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这主要靠增加资本的数量和改善资本的用途。他断言资产阶级对推动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强调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他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协调，可以达到社会最大限度的福利。个人为了私利给社会造成的结果往往比他真心实意要造成的结果更有效。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

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① 他主张国家的作用应仅限于维护国家和个人安全，以及举办一些资本家私人经营无利可图的工程。

大卫·李嘉图认为，社会只是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此个人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是互不冲突的。他断言：“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② 他认为资本家发展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来源，积累又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则使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因此，资本家出于个人的动机拼命追求利润，最终也就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繁荣和富庶，提高了全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将使利润集中到最有效的、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主那里去，从而会促使经济剩余更快地增长。李嘉图的这种发展观，显然是片面而狭隘的。

法国的西斯蒙第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提出国家应该限制竞争和干预经济、实行公平赋税、控制人口生育等主张，对资产阶级“为生产而生产”的发展观作了尖锐的批判。他主张用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组成的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无疑是一种反动的幻想。不过他批判李嘉图把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忽略了人的需要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西斯蒙第认为，财富只是达到人的需要的手段，财富应保证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幸福，这在一味强调财富增长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阵营里，树起了一面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②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13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独特的旗帜。他的发展思想，与其说接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如说更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

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作为后起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他认为：“从经济方面来看，国家都必须经过如下各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阶段、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①在前三个时期及转入第四时期的初级发展阶段，应该实行自由贸易，通过输出农产品输入工业品使本国繁荣；但当本国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时，应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利于本国工业的发展。他主张通过以保护关税为主并包括实行专利政策、发展教育事业、制定经济立法、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措施来振兴德国经济，赶上和超过英、法两国。

李斯特提出了经济跳跃发展的理论。他认为落后地区应注意培植和引进较先进的生产力，而其关键在于教育和技术。他认为脑力劳动、管理、组织等都应包括在生产力之内，这是人类知识积累所创造的生产力，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落后国家如将其资本大量地、主要用于物化生产力，在短期内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出现一次跳跃，但如果精神资本不够，则社会经济不可能出现连续的跳跃发展。李斯特主张一个国家应该把国民收入的最大一部分用于对后代的教育事业，用于人力资源的投资，这一见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的看来，古典经济学家的发展思想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还未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视野。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利润和财富的增加，而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①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写道：“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着眼于物的增长对社会发展提出了他们的见解，那么空想社会主义者则从人的解放的角度设计了未来社会的构造方案。空想社会主义最著名的三位代表是法国的昂利·圣西门、沙利·傅立叶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们为“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创始人”。

圣西门出身于贵族之家，从 42 岁起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发表了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圣西门认为，人类历史是理性进化的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自身完善化的过程。他指出：“现代的社会真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的写照”；“能使社会上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推动文明和科学最大进步的新制度必将代替旧制度”。他主张在未来的社会里实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按能力计报酬，人人都参加劳动。他相信将来国家会消亡，军队和警察也无存在的必要，对人的统治将会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圣西门把无产阶级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国王和资本家身上，曾多次向他们呼吁，请求他们帮助无产阶级建立新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在圣西门死后，他的门徒在工人中间组织消费公社和劳动公社，规定每个社员要把自己的全部收入交给公社，在公社中一起生活、一起劳动。这些公社大多因管理不善、亏损过多而破产，还有一些在反动政府的迫害下被迫解散。

傅立叶认为，人的情欲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人的情欲是天生健康的，社会不应当压制人的情欲。他指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喜欢某种劳动，但这种劳动欲常常受到社会的抑制；“雇佣劳动制是复活了的奴隶制”；如果社会能唤起人的劳动欲望，使劳动成为人生的乐趣，那么社会就不会有寄生现象。他说：“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他主张在未来的“和谐制度”下，社会按

1620 人规模组成一个名为‘法郎吉’的基层单位,其中城乡,工农、脑体劳动相结合,生产、分配、消费相结合,劳动、学习、生活相结合,男女完全平等,儿童从小接受德、智、体几方面的良好教育。他搞的试验性‘法郎吉’由于资金不足、管理不善而失败。

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有名的是英国的欧文。他认为私有制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而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是“伟大改革的时期即将到来的标志”。他主张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使人得到解放,使人的理性得到全面的发展。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由几百人到几千人组成的劳动公社;“每个新村形成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欧文于 1820 年来到美国,在印第安纳州买了三万英亩土地,办起了一个“新和谐”公社。全体社员集体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诚实、节制、勤奋、清洁等特征的新型的人。欧文在公社开幕典礼上宣称:“我到这里来,是要建立一种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要将愚昧、自私的制度变成文明和谐的社会制度。它要把各种人们熔于一炉,并且铲除产生人与人之间各种对抗的根源。”他试图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新村的示范作用,使新的社会制度传播开来。不过欧文的“新和谐”公社最后还是失败了。

自 1825 年起,至少有 200 个乌托邦公社在美国进行试验,历时 70 年之久,结果统统失败了。这说明空想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是行不通的,但它反对剥削、提倡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的设想对工人阶级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二、马克思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把人的解放和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观点，同时又对它进行了革命的改造，使之从空想成为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汪洋大海包围下，社会主义的公社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首先掌握政权，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把一切生产资料控制在劳动人民自己手中。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马克思说：“一个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而在达到这一理想社会之前，无产阶级的目标是争取自身及全人类的解放。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导致财富的增长和大部分人的日益贫困，整个社会分化为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者和无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过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全世界同时取得胜利，至少是在英、法、德、美等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他说：“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①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并没有忽略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并没有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否定了经济发展。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统一起来，使社会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牢固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各自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认为社会发展

^① 《共产党宣言》第 43 页，人民出版社。

的基本动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而生产力是其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并开始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工业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代表,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它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物质财富将像喷泉一样涌现出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将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对后来的发展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未能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更多的探讨。他认为,发达国家是不发达国家的榜样,不发达国家迟早都要走发达国家的道路。他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①“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②

马克思愤怒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野蛮剥削和掠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8—11 页。

② 《共产党宣言》,第 28 页。

① $i\hbar \frac{\partial}{\partial t} \Psi = \hat{H} \Psi$ ② $\mu \frac{d^2 x}{dt^2} = -\frac{dV}{dx}$ ③ $\frac{d^2 x}{dt^2} = -\frac{dV}{dx}$ ④ $\frac{d^2 x}{dt^2} = -\frac{dV}{dx}$

②

70

A. W.

B.

②

字

25 926—927

36 550

• H.

E.

•

1971

50 60

70 80

50 60

巨大变革,人类才能最终消除不发达与压迫。

1974 年,几位拉丁美洲学者在一份名为《是灾难,还是一个新的社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发展模式,通常称为拉美模式或‘巴里洛克模式’(由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而得名)。

拉美模式认为,发展的基本问题是社会政治问题,不发达国家不能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必须走一条新的人类发展道路,通过政治决策实现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分配的最优化。

拉美模式所构想的世界社会是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它的基本原则是:承认每一个人为了生存,具有满足其基本需要——食品、住房、保健和教育等不可侵犯的权利。它强调一切人充分参与社会决策,由生产单位、各种委员会或国家机关来负责生产资料的使用和管理,从而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

拉美模式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它根据 70 年代的消费水平和趋势,把基本需要的最低水平确定为:每天人均消费 3000 大卡和 100 克蛋白质的食品,每户 (2.9 至 3 人) 50 平方米住房,从 7 岁—18 岁的 12 年基本教育,然后根据各地区 1960—1970 年的有关数据,推算出满足基本需要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拉丁美洲这一标准为 809 美元,非洲为 559 美元,亚洲为 506.20 美元等。

这一模式强调人的基本需要、强调平等和社会公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所构想的理想社会却未免带有空想的色彩,而且单纯依靠政治决策能否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还是一个疑问。

拉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执政后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穷人的生活,结果却导致经济崩溃。1970 年智利的阿连德政府上台,1971 年工人实际工资增加 17% 左右,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所得份额增长了 52—62%,但由于投资减少、资本外逃,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72 年智利的实际工资下降 10%。

1973 年下降 32%，最后导致大罢工和军人政变，阿连德总统也以身殉职。1983 年秘鲁在加西亚政府统治下，采取哗众取宠的做法，工人实际工资增长 27% 左右，但接着引起股票暴跌、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外汇储备迅速减少，实际工资在 1988 年下降 34%，1989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2700%，失业和半失业人数达 11%。报纸称秘鲁已进入世界最贫穷国家行列。巴西在 1985—1988 年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说明单纯依靠政治决策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财富首先要创造，然后才能分配。在经济落后、人口增长过快的贫穷国家里过分强调公平分配只能导致贫穷的普遍化。要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只能是欲速而不达，反而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世界银行的发展援助在 80 年代从强调公平分配更多地转向强调经济增长，而基本需求方案则渐渐不为人们所重视。

法国的新发展学派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强调社会观念的变革和人的因素的作用，认为发展应该定义为消除贫困、失业和收入的不平等，定义为社会进步和人性的提高。

弗郎索瓦·佩鲁认为，发展只是提高人性的一种手段，发展应该同社会经济进步联系在一起，而进步则是根据获得自由的程度来衡量的。

法国的新发展学派主张实现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但他们认为工人的解放与控制生产资料无关，而是同各种制度和社会竞赛规则有关。他们提倡通过民主选举、多党制及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使社会的冲突和合作协调起来。不难看出，这种人道主义的发展观，同西斯蒙第、斯宾塞等人的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曾经说过：“理想人的终极发展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法国学者 L·J·勒布雷说：“发展作为一种

行动，无非是和谐与协调的演进过程中的一系列过渡，即从较少人道的阶段向比较人道的阶段过渡”。帕特里克·纪劳蒙则认为，“发展即是人的才能增长和完满”。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强调人性的完善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性。不过，法国新发展学派强调人的发展，主张社会平等，这些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社会发展应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社会发展不应局限于经济增长。

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的决议，提出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住房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联合国发展十年：行动的目标》这一文件中指出：“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增长，而是发展。发展就是增长加变革；变革既可以是社会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经济的；既可以是性质上的，也可以是数量上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曾总结了一个公式：发展 = 经济增长 + 社会变革。这一概括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吴丹的公式把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而且对社会变革的含义解释得不清楚。不过平心而论，吴丹的公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其特点是简洁和概括性强，然而正因为它过于简洁，所以人们对它产生了不同的解释。

联合国的发展战略始终是围绕着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而制定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第47届联大作的报告中指出：“两极对抗已成为过去，目前世界展现了一个全球合作促进发展的雏形。大家普遍认识到，民主结构、人民参与和尊重人权是发展过程中创造力的来源。最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发展眼光逐渐出现，发展日益成为了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必须是改善人的境况。从这种观点看，发展是个全球性的目标，因为差不多全世界都需要在社会公正和经济增长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以维利·勃兰特为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在一份题为《争取世界的生存》的报告中写道：“要给发展下一个使人人都满意的定义是永远做不到的。笼统地说，发展是指社会和经济取得称心如意的进展，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称心如意，总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发展必须意味着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为了实现这一点，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忽视了增长的质量，也不注意进行社会改革，就谈不上什么发展”。“现在人们普遍承认，发展必须包括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改造。这包括生产和需求方面要有所变化，收入分配和就业状况要得到改善。这意味着要发展更为多样化的经济，其中几个主要部门之间在提供投入和扩大产出市场方面要建立更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

1987年成立的以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为主席的南方委员会，花了三年半的时间，组织学者编写了一份名为《对南方的挑战》的报告，分析了南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和形势，评估和总结了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并提出了今后可采取的对策和建议。南方委员会综合了70和80年代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以充分开发各国特有的资源为基础、以满足本国人民基本需要为方针的发展观，提出了自力更生和以民众为中心的发展观。

南方委员会认为：“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使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建立起自信心，并且能够过上自尊的和充分发挥才能的生活。发展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使人民从贫困和剥削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它又是一个摆脱政治、经济或社会压迫的运动。通过发展，政治独立获得了真实意义。而且，发展还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增长过程，它通过人民的参与来实现。”

报告指出，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是为了人类潜力的发挥和人民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而且必须是为了确保人民自己认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的实现。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消灭贫穷、提供就